

五四运动100周年与青年发展

主持人 陆士桢(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在五四运动10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启和激活五四话语,对于传承五四精神、实现中国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五四先贤的强国梦想、100年来人民的创新实干,成就了中国的新时代。而作为“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的中国青年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寻梦追梦,成为传承五四精神、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本刊特邀三位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五四精神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影响,解读五四时期青年的选择及其后的分化,剖析100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彰显的时代与青年的辩证关系。期望这种从不同视角对五四运动革命运动、思想文化运动、青年运动不同属性的思辨,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给“强起来”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及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以及青年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

五四百年: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

■ 石仲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80)

【摘要】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也是爱国主义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长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思想解放经历了五次大高潮: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运动;三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四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五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胆反腐倡廉。这五次思想解放高潮的辉煌成就告诉我们,思想解放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五四百年 思想解放 新文化运动 发展马克思主义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9.02.002

五四运动是进步的中国人无比兴奋激动、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它具有新文化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两大内涵,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神州大地上爱国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中西文化高度交融、冲破封建罗网

收稿日期:2019-02-12

作者简介:石仲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党的历史、理论和人物。

的新文化运动打碎了中华民族长期的思想禁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将五四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在政治导向上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主义性质,在思想认知上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长河,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个巨变,从思想认知方面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艰辛辉煌的运动。

一、五四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五大高潮

五四运动百年,对于进步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为寻找救国济世真理,追求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代又一代人坚持思想解放的过程。只有思想解放,才能获得救国真理;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制定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然而,思想解放既不是径情直遂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由于主客观方面诸多原因,思想解放的历程如同大海的潮水: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集中、波澜壮阔,处于高潮态;有时则相对缓和、平静,为非高潮形;有时则为不见波浪的退潮状。

五四百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思想解放有五次大高潮。

第一次大高潮是作为百年来思想解放源头的五四运动本身。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国拯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引入近代文明。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引入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猛烈地批判宣扬封建礼教的旧文化,使上世纪末由维新变法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汹涌澎湃而来,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革命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当时的先进分子面向世界,在广泛接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中,选择了通过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五四革命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出世了。从这方面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五四运动直接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也由于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它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二次大高潮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虽然经历了两次胜利,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党的领导层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但这“两化倾向”没有根本扭转。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上说,就是破除这“两化倾向”,批判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及政治路线,因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了它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为后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包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内的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第三次大高潮是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基础上召开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伟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都遭到严重伤害。“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处于

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受“文革”那种思维定式的毒害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冲决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的思想束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我们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

第四次大高潮是以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为开端，以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标志而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还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是西方化、自由化，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易帜”，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需要作出明确回答；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的老路的困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驳斥各种错误观点，消除了一个时期许多人存在的迷茫。他指出：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2]这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获得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南方谈话”因而被称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它的直接理论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和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其实践成果就是我们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从未有过的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

第五次大高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对四风”、惩治贪腐的斗争，成功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不可能。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价值观甚嚣尘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广为流传。但是，党中央不信这个“邪”，破除了许多人的三大顾虑（一怕损害党的形象；二怕影响经济发展；三怕波及社会稳定），决心猛药去苛、重典治乱，义无反顾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短短几年，“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党和国家的面貌实现了惊天逆转。我们党反腐败，党未亡、国也未亡，并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反对腐败，并以铁的事实粉碎了“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谬论。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从思想路线方面而言，就是坚持解放思想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不解放思想，怎么敢这样刮骨疗毒、自我革命呢？绝不可能！因此，这是五四百年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高潮——只是它表现为不同于以往的非典型形式。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种非典型性，就否认它是思想解放的大高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展现。

二、五四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百年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获得、传播、学习、研究、信仰、掌握、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体地说,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使之不断地在中国具体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神州大地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一)在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中,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怎么认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主流?多少年来,见仁见智。客观地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一直将眼球盯着西方,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袁世凯复古倒退的逆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端,促使思想界深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难以救中国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需要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既是文化的觉醒,也是思想的启蒙。在鞭挞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蜂拥而至,竞相宣传所崇拜学说的媒体如百舸争流。在令人炫目的奇花异草中,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它的粉丝和追随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有着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说服力,易被如饥似渴寻找救国之道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希望。那种兴奋的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大量引进来。那时创办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内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达200多种。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很快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体。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等大量出版,成为哺育先进分子的乳汁。二是走出去取经,探求、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取经主要有三个方向:向东走留学日本,将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译成中文进行介绍;向西走旅欧勤工俭学,到法英德等国攻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向北走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留学,并迅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有两位巨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一位是陈独秀。他有着反对军阀统治、谋求民众幸福的历史担当精神,是个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他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勇敢、坚决地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的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迅速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另一位是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给陈独秀以很大影响,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坚定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洪流。在五四爱国运动后,他主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有了南陈北李两位思想解放巨人建党的努力,神州大地终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思想解放大潮的新生儿。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历史性飞跃,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一个时期,对延安整风运动有不少负面说法。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延安整风运动历史。要对这段历史有正确评价,一是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那几年的史实;二是要有正确立场、观点、方法的价值取向。延安整风运动不可能没有缺点,但那种将整风运动说成“权力斗争论”的观点,却是没有任何站得住的史实根据的臆断。全民族抗战展开后,共产国际已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3]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根本不存在毛泽东为争夺领袖权力而斗争的问题。

为什么将延安整风运动定位为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并且其主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在不成熟时期,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现象,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一些人开口闭口就是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不问中国具体实际。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讨论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问题时,博古就引经据典,不赞成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认为这是背离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当即指出,我们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得出的认识。难道这样做就是对老祖宗“不忠”“不孝”吗?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在抗战前期,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因此,毛泽东在做整风动员讲话时多次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种态度,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我们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批评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指出,一些同志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很会的,但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则是不会的。他们学习马列理论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列的。这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他还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以降妖捉怪一般。”“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4]经过整风运动,博古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这些年才深深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危害极大。”因此我们说,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就是从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

第二,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对待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不唯上,要唯实。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听命于苏联共产党的。对于还不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产生这方面的错误倾向有其客观原因。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到延安的王明,不问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侈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指责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与会多数人员长期受传统观念束缚,为王明的“钦差大臣”身份所蒙蔽,纷纷做了检讨,使毛泽东十分孤立。国共合作中讲团结不敢斗争的倾向,使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受到

影响。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与王明鼓吹两个“一切”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皖南事变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曾指出,过去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我们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广大共产党人不仅从“唯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唯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纠正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形式主义盲目态度。

第三,这次运动是要使我们党从过去统治中央3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完全解放出来,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遵义会议没有提出那时中央的路线问题,那时的领导人就以为不存在路线问题。王明自视一贯正确,到1940年3月还将其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在当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问题。他指出,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但是,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指示编辑了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历史文献数百篇。它使许多同志了解到党的历史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同时,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承认错误,放下包袱,解放了思想。如毛泽东所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张闻天检讨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是路线错误,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通过整风运动,张闻天发生了巨大变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延安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经过上述三大解放,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共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我们党不仅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还需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经过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伟大成果。

(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近百年历史有两次伟大转折:第一次是遵义会议,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又一次伟大转折呢?这就不能不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说起,也不能不涉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指导方针。

首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时间

内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大规模建设,并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目标奋进。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尽管那时的党政机关有消极腐败现象,社会上也存在一些阴暗面,但没有严重到要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群众性急风暴雨的政治大革命方法来解决的地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它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在党内根本不存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企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个伪命题。“文化大革命”搞“乱”的,是经过十多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骨干;被迫害的“反动学术权威”,许多都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党心民意所向。

其次,“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等中央领导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此后也做了许多工作,社会在走向正常秩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揭批“四人帮”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受迫害的广大干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决策。那时,华国锋等同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无法深入展开,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工作,包括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工作问题受到拖延和阻挠。这就严重背离了党心民意,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ABC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标准,是历史实践还是领导人的指示?邓小平最早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准确、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5]在报刊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邓小平坚决支持,指出: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6]因此,批判“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其规模是空前的。

最后,为什么这次思想解放大潮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是因为“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社会讨论各种意见都有,争执激烈,不能形成共识。思想路线不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命运问题就解决不了。因此,必须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指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他还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和习近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既充分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根本缘由,又充分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因此,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在五四百年历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四) 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它集邓小平思想理论之大成,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它论述的许多观点,诸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都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若讲“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最为突出的还是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构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有的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在我们国家,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毛泽东甚至还提出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闪烁着耀眼智慧的思想,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并非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因此,囿于传统观念束缚或“左”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鼓吹市场经济被视为离经叛道,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使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在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有的学者甚至萌发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但是,主流思想仍然是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没有被紧箍咒所束缚,改革开放伊始,就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十多年间,他前后讲了十三四次之多。最初,曲高和寡,响应者寥寥。历史的发展是个渐进过程,他个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愈益成熟坚定;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逐渐赞同、接受他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能解放生产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还是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党的十四大报告正是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上述思想,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四届三中全会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五四百年来第四次思想解放大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成果。

(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提到了新的高度,开启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贪腐、自我革命,成功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不可能,推动五四百年形成新一波思想解放大高潮。

在这次思想解放大高潮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在理论上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领域广、覆盖全面,科学内涵异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民族性、实践性特征。就理论传脉来说,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借鉴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精神追求、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最新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同党的其他指导思想一样,作为发展的理论,它还会在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境界。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百年来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

三、五四百年来思想解放艰辛辉煌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孕育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仅肩负起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而且超越这一使命,还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奋斗。百年历史,无论是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乃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需要解放思想。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不解放思想不行,包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都需要解放思想。五四百年的思想解放之路,既成就辉煌,也极其艰辛。

纵观五四百年,至少有这样几点重要历史启示。

(一) 解放思想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既然五四百年思想解放的主线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百年历史之所以艰辛辉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要做到真正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党在幼年时期,如毛泽东所说,将马克思视为神秘的“先哲”,以为写在书上的就是对的,不问具体情况照搬照抄,因而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

化、神圣化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上述王明“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再就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1976年10月以后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出现“两个凡是”指导方针,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正义得不到伸张,林彪“四人帮”罪行得不到彻底清算。尽管这两次政治错误性质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但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是共同的。王明错误路线通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这才有全面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这两次教训是深刻的。前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后者是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搞教条主义。这说明反教条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此时反了别人的教条主义,彼时自己可能也犯教条主义;前人犯了教条主义,后人没有免疫力,不坚持思想解放,照样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因此,任何时候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破除各种迷信,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要采取科学态度,减少盲目性,增强彻悟性;减少唯上唯书性,增强求真务实性。

(二) 解放思想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一切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既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有现实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历史的演变发展;既有对经济社会物质资源层面的认识,更要注重对人民群众诉求的倾听;既要注重当下的静态关系,还要关注现实的动态变化情况。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系,不是简单的平面图。具体说来,中国的具体国情至少有这样一些内涵: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历史强国、近代弱国。中国国情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中国和世界等诸多要素的,是涉及中国的各种矛盾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人民群众、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对外关系等内容。显然,这是思想僵化、奉行本本主义的人很难完全把握的。王明教条主义者缺乏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推行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就成了必然结果。如毛泽东所说:“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7]当然,要把握好中国国情,有一个认识过程。但王明教条主义者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不愿深入了解它,就不能不造成那样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搞本本主义,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深入认识。还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真实的情况。延安整风时,他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这就要“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8]。正因为如此重视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了解,毛泽东才能比其他领导人更早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个最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做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9]。党的十三大阐发了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

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了深刻论述,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变。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没有出现过去那样大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分析及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新特征,也是对于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认识。正是基于这个新认识,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部署和长远规划。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认识,在多年前就已提出。过去长期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符合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不断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如何重新认识和表述,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和研讨。在准备十九大报告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最终形成了这个准确反映当前实际情况的新认识。为什么十九大报告能做出这样的修改呢?这就是思想解放的巨大收获。十多年来,有一个“死结”没有解开,即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紧紧地捆在一起,担心改变主要矛盾的认识,就会动摇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判断。十九大报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两者“松绑”:只改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论断。这就是思想的一大解放!在理论认识上,这是一个重要创新。

(三) 解放思想要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正确认识中国,就需要将中国放在世界中来认识,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五四运动就是坚持世界眼光,才具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内涵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也是坚持世界眼光的重要体现。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这是解放思想的要求。

毛泽东虽未曾出国留学,但历来有世界眼光。在延安,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认识。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发生了“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10]。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更加充分地显示了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不怕外国的好东西,凡是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我们统统拿过来。到了近代,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也有一个很高的高潮。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党的八大期间,他还指出,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与毛泽东的思想高度解放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那一代人中的翘楚。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晶。此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他提出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1]。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他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考察,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解放思想的视野达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像这样鲜明地将我们党定位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表述是不多见的。这个定位完全把我们党融入世界之中,不仅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也有助于消除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误解。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放思想的世界眼光有两个大的手笔:一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连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2]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面对动荡不定的世界变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并被联合国多次写入文件进行宣传。二是提出“一带一路”(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参与。这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打造的重要平台。它开辟了我国引领世界开放合作的新路径。这两大战略构想是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说明我们国家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 解放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放思想有三大底线:一是学术底线。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讲的,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要迷信。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二是道德底线。任何时候都要遵守人类公德和社会伦理,那种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与思想解放风马牛不相及。三是政治底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解放思想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我们倡导解放思想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不论遇到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13]。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干部反对本本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弘扬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人民赞成不

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我们的政策对不对、工作好不好的标准。他对江泽民等领导人作政治交代时指出,新的中央一定要是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是向人民亮相啊!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党的政策更能获得人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这个政治交代,坚持解放思想惩治腐败,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江泽民深情地说,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在开拓中进取。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胡锦涛在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时也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前面讲到的严厉惩治腐败的思想解放,就鲜明地、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月的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指出,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党不负责任。”“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诛一恶则众恶惧。包公把‘龙虎狗三具铡刀摆在开封府大堂之上,无论皇亲国戚还是高官小吏,谁敢以身试法,都毫不留情。反腐败斗争没有禁区,没有特区,也不能有盲区。我们要把反腐败利剑举起来、用起来,形成强大震慑。”这一席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它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思想解放的准绳,也说明习近平的思想解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五四百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波澜壮阔、挫折转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百年,但民族复兴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须继续坚韧奋斗。实践没有止境,思想解放没有穷期。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战胜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风险,克服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669页。
- [2][9][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252、79页。
- [3]《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页。
- [4]《毛泽东选集》,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35、947页。
-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91页。
- [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 [1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10页。
-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6页。

(责任编辑:任天成)